



历史创造者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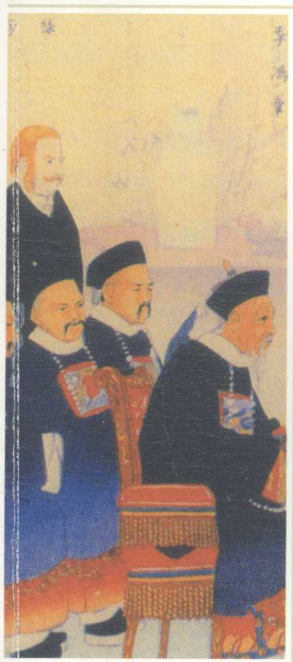
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

楼宇烈 雷颐 葛剑雄 秦晖 高全喜
杨天石 张鸣 吴思 陈明 马勇
隆重推荐 (按姓氏笔画排序)

房德邻◇著

「晚清」

天朝威仪在列强的船坚炮利面前轰然坍塌，
面对这「千年变局」，以及心理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晚清督抚们又将如何演绎自己的历史角色？



安徽人民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013068137



历史创造者

K252. 09
16

——
晚清
——

房德邻
著



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

10



安徽人民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北航

C1675676

K252.09
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 晚清卷 / 房德邻著. --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3.6
(历史·创造者: 图文版)

ISBN 978-7-212-06626-0

I. ①封… II. ①房… III. ①中国历史—清后期—通俗读物 IV. ① K25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1923 号

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

作 者 | 房德邻

出 版 人 | 胡正义

图书策划 | 陈丽杰

责任编辑 | 陈丽杰 李 争

营销推广 | 王 颖

责任印制 | 刘 银 范玉洁

美术编辑 | 陈喜艳

封面设计 | 雨 霖 程 慧

出 版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 230071

发 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010-64267397

印 刷 |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1000 1/16

印 张 | 15.5

字 数 | 171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212-06626-0

定 价 | 36.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再版总序

这套丛书的组织、撰写和出版至今，已经悠悠 20 年过去。对于一个普通的学者来说，20 年差不多是其学术生命的一半。本丛书的作者或从青年进入中年，或已自工作岗位上退休多日，回看这套书，眼前已不仅是由一个个历史人物编织成的历史画卷，还有各自 20 年学术生涯的风雨如磐。

当年组织这套丛书的初衷，是希望专业的历史学者用比较通俗的形式，给读者奉献一套比较生动可读的历史读物，既不失学术性和思想性，也充满趣味性，使社会大众更喜欢历史，更理解历史。这些想法的详细表述仍可参见原书总序，兹不赘述。

由于各种原因，这套丛书在当年并没有引起巨大的反响，这让我想起我多年前在《光明日报》上一篇小文中的话：

我们指出了史学价值或功能之实现，不仅依赖于史学及史学工作者自身的改造，也有赖于受众自身的改造。但这并不是说，史学只能消极地等待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是说，要想成功地实现史学的价值，必须依赖全社会的努力。^{〔1〕}

当时的情况是，在改革开放进行到第十个年头的时候，商品大潮涌起，传统基础学科不为人所重，历史读物无人问津，业内对“史学危机”议论频频。我当时以为，除了历史学者自身的问题外，当时的社会氛围也不可能形成对历史作品的关注。

时至今日，情况已然大变，社会对历史题材的兴趣变得浓厚了许多，央视《百家讲坛》讲秦汉，讲唐宋，讲明清，一时间吸引了许多普通观众的眼球。一些对历史感兴趣的作者撰写的通俗读物（如《明朝那些事儿》等），也颇受市场欢迎。这固然有传播方式已突破了传统的纸媒、变得多样化的缘故，与学者放下身段，采用类似“说书”的方式有关，也与受众的水平和眼界提高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目前国内旅游业大盛，效益不知已比20年前翻了几番，但游客无论去国内旅游还是到国外观光，除了自然风光外，最多的就是历史遗迹，大家耳濡目染，慢慢地就对历史多了几分兴趣。过去人们到北京旅游，“白天看庙，晚上睡觉”，意思是那时旅游只有看故宫、天坛、雍和宫这些“寺庙”，晚上又没有什么夜生活，十分枯燥。待人们对历史有了几分兴趣，有了几分知识，再去看就没那么枯燥了，就是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这样看来，我在20多年前的想法还是无误的。普通受众中的内行越来越多，这是历史学者乐于看到的。

2006年前后，由于社会上对通俗讲史与写史现象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一些媒体希望我谈谈自己的看法，多次婉拒之后，终于将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发表在刊物上。我在该文中指出，通俗讲史与写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个传统与专业的讲史和写史具有不尽相同的取向，表达的是不同的历史观，所以这个传统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目标是真正认识这个时代，我们不能总是用本专业的某些优长，去评价别人的短处。我们需要站得高一点，

看得远一点，说得中肯一点，这才是我们史学家的本事。否则我们研究历史会变得寻章摘句，而不是对历史有宏观的思考和把握。这不是一个达到很高水准的表现。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面对这种现象应该很平淡，不应该让社会感觉到我们很焦躁不安。我们不能自己放弃了这个普及历史知识的责任，却在不断地指责他人；我们需要做的，是对古今中外通俗讲史的情况认真做点研究。^[2]

又是6年过去，我自己没有对通俗讲史的传统做出任何研究，也没有再写什么通俗的历史读物，但我并没有停止相关的探索。我发现，一些影视工作者开始对历史题材感兴趣，但是，由于没有有能力的专业人士介入，他们只好亲自操刀处理这些极为复杂的题材。他们往往查阅了许多论著，也咨询了相关专家学者，但由于不具备专业素养，使他们无法分辨孰优孰劣，无法超脱旧观念的窠臼。比如，电视片《圆明园》以郎世宁及其作品为主线，展现圆明园这个“万园之园”的盛衰，播出后颇受好评，但是，它仍然讲述了一个大清王朝在乾隆时期达到极盛，而到晚清则以“火烧圆明园”为标志，在列强挤压下走向末路的传统故事。可以说，只要读过中学的历史，对这一历史叙事都会耳熟能详。影片给观众留下的，只是新技术手段造就的瑰丽画面，却缺少打动人心的思想。

我们这套书出版后，《博览群书》的李焱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讨论，后来以《历史学术如何走向大众》为题在该刊上登出。在讨论中，作者王和曾提到他当时看到一则报道，是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上映后，一些影视专家批评该电影过于沉闷，陈凯歌辩解说，他就是想通过这个故事来表现那个时代的人们精神。王和认为，陈凯歌未必知道秦的时代精神是什么。我相信王和的判断是对的，陈凯歌力图表现的，至多也只是他自己理解的秦的精神，并不是根据史实总结出来的。

我们当然不能苛责这些影视工作者，我们甚至应该感谢他们，用普通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尽管并不尽如人意；我们必须审视自身，为什么多年来的历史教育只朝向一个归宿，即培养历史学家？为什么少有能够用学术语言以外的语言（如文学语言、影视语言，甚至音乐语言）传递最新的历史内容与思想的人才？经过严格学科训练的高学位毕业生为什么只能挤向高等院校和研究所这条独木桥？20年前我呼吁全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助于史学价值的实现；20年后全社会文化素质的确提高了，就要求我们这些人不断拿出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上的精品，否则又怎能抱怨荧屏上清宫戏的泛滥或者对历史的戏说？

我并不奢望创作于20年前的这套书正是这样一套精品。在上述《博览群书》的讨论中，我在介绍了各书内容之后，多少还是表达了一些遗憾。这毕竟是多人合作的结果，各自的文风和对主旨的理解多少会有差异，因此不可能要求整齐划一。但是，这毕竟反映了我们当时所做的努力。这次再版，本应做一些大的调整，向我们希冀的目标更近一步，但大多只做了微调。正如，作者黄燕生说，当他重看自己的书稿时，觉得现在已经写不出当年那样的文字了。更多的作者，或因退休多年，或因身居领导岗位，或因教学科研任务比以前更为繁重，都只是稍做文字上的修订。我期望，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套书并未落伍。

我要感谢安徽出版集团旗下的时代华文书局落实本套丛书的出版。安徽出版界有我许多老朋友、老学生，现在都是那里的元老或中坚。我们的书花落此家，又为我们的旧谊增加了新的缘分。

这套书的再版也让我想到许多旧事：为本书的初版做过许多工作的潘平和林栋已经多年未通音讯了，陈琳国、房德邻、沈长云诸学长也难得一见，葛承雍、王岗、黄燕生、彭卫均有职在身，诸务繁杂，林乾略年轻，正是

工作繁重的时候，王和一贯自由散漫，倒是可以偶尔相聚，不过与当年经常在一起“吹水”是不能相比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有同感。在那个时代，做书似乎是一种理想的实现，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好友。上世纪 80 年代中，华夏出版社的《20 世纪文库》便是其中的一例，拉我参与的于沛兄一直是多年好友，最近也相见甚稀，至于主其事的邓正来更是英年早逝，天人永隔了！

也许本书再版问世时，是我们这些老友重聚的珍贵机会，这也许和书的出版同样重要吧。

赵世瑜

2013 年 2 月 23 日识

注释

[1] 赵世瑜：《实现史学价值与社会条件》，《光明日报》1989 年 2 月 22 日第 3 版。

[2] 赵世瑜：《一个追求，多种声音——关于近年来的通俗写史或讲史现象》，《社会科学辑刊》2007 年第 2 期。

初版总序

畅游中国历史的长河

历史学术走到了今天，突然面临着巨大的冲击。

这个冲击来自两方面：一是商品化趋势的冲击，一是学科内部发展的冲击。历史学术能否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创造效益？从一个方面来看，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历史学创造的是精神产品，它必须通过“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心灵，而无法立竿见影地创造利润价值。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答案又是肯定的，因为中国人本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感的民族，对历史一直存在浓厚的兴趣。从唐宋时期说书场上的“或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到今天大量历史题材的影视、小说的流行，甚至各种历史古迹、文物古董全都被卷入了商品化大潮。

来自学科内部发展的冲击也同样猛烈。从哲学上看，历史学术是否能像以往人们确信不疑的那样肯定获得客观的真实？历史学的真理性靠什么来检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已经变得多种多样，起码人们认识到了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大量主体因素是几乎无法避免的，人们只能相对地接近历史的真实，而无法绝对地获得历史认识的真理。意识到这一点，并不等于说让我们干脆放弃对历史真理性的追求，而是让我们的头脑更清醒一些，认识到我们自身的

和学科所固有的缺陷。

从内容上看，历史学术如果仍然把自己的目光局限在极狭小的政治史领域、局限在“英雄们的历史”和重大事件的历史上，而不注意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小人物”的历史，不注意了解“人”而只是面对一个个无生命性格的政治机器或军事机器，那肯定是要“自绝于人民”，或者只能成为“影射史学”或类似的政治工具。一位史学史专家曾经对我说，古代史家讲过“逆取”与“顺守”的道理，就是说打江山的时候要扭转乾坤，与命运搏斗，而守江山的时候则要顺乎民心，顺其自然。从历史上看，“逆取”的时间要比“顺守”的时间短得多，历史学家为什么总是愿意盯着前者不放呢？

从方法上看，为了让广大群众接受历史学家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提取出来的经验和思想精华，首先就要设法增强他们对历史的兴趣，加强他们的历史感，这本来就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我非常钦佩已故的吴晗先生等人，他们编出来的历史小丛书，也许在社会效益上比一本博大精深的学术著作还要大。如果通过这样的努力，使普通读者的历史认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对于历史学术来说，贡献有多大呵！人们始终在期望着能让读者看懂、而且看得有兴趣的历史学术著作，这应该是史学工作者的努力方向。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面对这来自两方面的冲击呢？

想到这里，不能不提到几部令我印象颇深的海外历史读物。一部是《光荣与梦想》，称为本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美国实录”，作者自由纵横的笔法和译者高超的译笔使我了解了美国的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百态，尽管读后已有十几年过去，但我依然认为，现在还没有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美国现代史能比它更出色。另一部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它的写法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史著作，尽管对书中的某些观点我始终不能苟同，但那种跳跃的思路、活泼的笔调和自由的议论，正是我们的历史著作所缺乏的。除此之外，关于美国史的《美国人：开拓历程》三部曲、关于中国近代

史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以及没有翻译过来的、史景迁的《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上引起人们的兴趣。

于是，这些著作不仅在原出版地，而且在中国，都引起了读者的浓厚兴趣，它们虽然是历史著作，但却有大量非历史专业的读者；它们虽然是百分之百的学术著作，但却一次、两次地再版，成为畅销书或者常销书，从而获得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效益，这难道不应该对我们有所启示吗？

以上的一些想法，就成为这套图书产生的思想背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套书，就是一些中青年历史学家在更新传统历史撰述面貌方面所做的一点尝试。相对比较“正统”的历史学术著作来说，这套书的写法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但仔细阅读下去，又发现它们的确就是学术著作：不仅言之有据，置有大量注释，而且作者的议论和分析充溢于全书之中，不乏精彩的思想火花。

酝酿这样一套书，大约是在5年多以前。当时，我与这套书的主要作者之一、《历史研究》编辑部的王和先生商量，能否创作一套雅俗共赏的历史学术著作，而这套书的要求是，每部书都要用一个人物群体作为主要线索，通过这个人物群体的活动，反映出他们所处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时代特色。这套书绝不能写成特定人物群体的合传，人物只是穿针引线的引子，最终目的是写历史。但这一历史又不要求面面俱到，要重点突出。同时，要切忌写成呆板的叙述史，而要充分展开议论，即所谓老生常谈之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跳出第三者冷静评判的圈子，加强主体的投入，如果可能的话，在自己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写出自己的秦史观、唐史观、明史观等等。在写法上，可以学习同类优秀著作的风格特征，可以大幅度地跳跃，可以采用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总之在革新历史撰述体裁方面做一点尝试。

以上的想法得到了许多有共识者的赞同，可是落实起来实在困难重重。许多作者虽然答应下来，但经过一番尝试，发现这比他们熟悉的传统写法要难得多，这也正是此书问世艰难，拖延了如此长时间的原因之一。此书终于

完成之后，也未必每一本都达到了我们预先设想的那个水平，有些差距小一点，有的差距大一点，这也是集体创作过程中较难避免的。但我们毕竟走出了第一步，虽然步履蹒跚，但总比原地踏步的好。在此，我们仅把此书当做引玉的砖石。

这套书的组织编撰，使我再次认识到了寻找作者之难，也使我又一次认识到了历史专业人才培养上的缺陷。按我们的初衷，本书作者应该是既在史学理论方面有一定造诣，又是某一断代史的专门研究者，这样，本书的质量就能得到保障。可一旦着手去做，就发现这样的作者屈指可数，而且这些人既有这样的特点，就必然工作极其繁多，无法保证工作的按时完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努力这样去做了。目前的这个作者队伍，仍然是有相当实力的一支学术力量，没有他们的合作，本书的完成是无法想象的。他们日常的工作都极其繁忙，或是担任部门的领导工作，或是承担着许多国家的研究项目，或是忙于自己的研究计划，或是身体多病，家庭负担繁重，但为了共同的目标，他们都先后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使我由衷地感动。中国青年出版社不仅排除干扰，承担了此书的出版工作，还将其列为他们的重点图书，也使我满怀谢意。

古人讲，一部好的历史书，要“精意深旨”，“笔势综放”，要“于序事中寓论断”，而且“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要“阅中肆外”，“居今察古”。尽管不知道通过我们的如此这般的努力，能否对付得了前面所讲到的来自两个方面的冲击，但我仍希望我们能不负古人的期望。

是为序。

赵世瑜

识于 1996 年 3 月

目 录

再版总序	1
初版总序	6

卷 首	1
-----	---

督抚制度是明清两代的重要官制，其建立、发展、变化对中国封建社会最后 500 多年的历史有重大影响。

第一章 睡眠初醒	7
----------	---

经过鸦片战争的重创，最先领略到西方文明——坚船利炮的东南各省的总督、巡抚们，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不能不做出反应，不能不开眼看世界，并在不自觉中产生了朦胧的世界意识。中国人的近代观念由此发端。

挑战与回应	8
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第一书	19
沿海督抚的困惑	33
“海上苏武”的悲剧	43

第二章 起于军兴

55

湘军是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军事力量，其“兵由将选”、“自筹军饷”的特点使其成为具有一定程度私属性质的军队。依靠这支军事力量，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得以发迹，湘系将领十人先后担任总督、巡抚要职，地方督抚的权势迅速膨胀，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于晚清政局影响至深。

曾国藩和湘军的崛起 56

李鸿章与淮军 67

从“祺祥”到“同治” 74

尾大不掉 82

第三章 中兴砥柱

89

如果说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主要依靠军事实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那么他们在同光新政时期则在经济、军事、政治、外交、文化各个领域扩大了势力和影响。

同光新政 90

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 101

清流派——慈禧太后的政治砝码 109

甲申枢变与书生典戎 116

春帆楼的耻辱 125

第四章 无力回天

139

戊戌变法、庚子事变、新政、预备立宪，清廷为挽救统治危机而做的种种努力最终都失败了，究其原因，时代已不再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了，满族亲贵和封疆大吏已经无力回天。

戊戌喋血 140

山东巡抚与义和团运动 148

东南互保与江楚会奏	155
炙手可热的袁世凯	165
丁未政潮	173
督抚与立宪	181
 第五章 翻云覆雨	 191
辛亥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督抚们或逃匿，或“翻手为云覆手雨”，附和革命，使共和革命获得廉价胜利，同时也埋下深刻危机。	
张之洞“种豆得瓜”	192
各省易帜	200
“洹上渔翁”出山	209
含泪逼宫	216
从督抚到都督	224

卷首

督抚制度是明清两代的重要官制，其建立、发展、变化对中国封建社会最后 500 多年的历史有重大影响。

督抚制度起于明代。明初，承袭元制，在地方设置行中书省，但改行省丞相为承宣布政使。布政使的权力远比行省丞相的权力小，元朝行省丞相“举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权力很大，而布政使只管民政和财政，司法、刑狱另由按察使负责，军事由都指挥使负责，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并称“三司”，彼此不相统属，省内重大军政事务须由三司会议，上报朝廷请旨。明太祖朱元璋实行这种地方官制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出现内轻外重的局面。但是三司并列制度由于权力分散，而效率不高，于是综理地方的督抚制度就顺理成章地产生了。

据载，明朝最早派出“巡抚”是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当时朱元璋虽然已建都南京，却不满意，御史胡子祺遂上书为他分析天下形势：“天下形胜地可都者四。河东地势高，控制西北，尧尝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带河淮，宋尝都之，然其地平旷，无险可凭。洛阳周公卜之，周、汉迁之，然嵩、邙非有殽函、终南之阻，涧、瀍、伊、洛非有泾、渭、灞、浐之雄。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1〕}朱元璋以为是，即派太子朱标巡抚陕西，考察秦地山川形势，省观风俗，慰劳父老子弟，准备在那里建都。朱标此行虽是“巡抚”地方，但其使命只是考察建都，并非管理地方，这与后来的督抚制度没有直接关系。至建文和永乐年间，朝廷才派出以管理地方为目的的巡抚。如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派吏部尚书蹇义、礼部尚书金纯等26人分赴各省，“安抚军民，询查利病”。但是蹇义等“巡抚”仍是临时差使，完成任务后或“还部治事”，或改派其他差事，他们还不是长驻的地方大员。到宣德年间（1426—1435），巡抚才是由中央派往地方的长驻官员，成为封疆大吏，于谦、周忱等都是这一时期